

中国现当代文学 前沿问题研究

陈思广 主编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QIANYAN WENTI YANJIU

非
外
借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资助

中国现当代文学 前沿问题研究

陈思广 主编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QIANYAN WENTI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庄 剑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 / 陈思广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690-1798-4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6686 号

书名 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

主 编	陈思广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798-4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4.75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现代长篇小说的史料发掘与史料整理	(5)
导 论	(5)
第一节 如何辑与如何用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与接受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7)
第二节 文学史观念的拓进与诉求	
——关于编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的几点思考	(16)
第二章 现代汉语宗教诗学	(28)
导 论	(28)
第一节 建立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导论	(33)
第二节 极限情景：史铁生存在诗学的逻辑起点	(47)
第三章 民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61)
导 论	(61)
第一节 民国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66)
第二节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	(78)
第四章 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问题、角度与方法	(91)
导 论	(91)
第一节 左右同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	(95)
第二节 新浪漫与国民性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方法问题及其他	(107)
第五章 四川现代作家研究的新视界	(120)
导 论	(120)
第一节 论何其芳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的杜诗影响及定位	(125)
第二节 早期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泪浪”	(134)
第六章 大文学视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47)
导 论	(147)

第一节 文史对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152)
第二节 五四文学运动的“革命”话语·····	(167)
第七章 21 世纪初文学的反现代书写 ·····	(183)
导 论·····	(183)
第一节 “反现代派”作家的文学史意义 ——以罗伟章为例·····	(188)
第二节 最伟大的书是命运之书 ——对话罗伟章·····	(194)
第八章 小说叙事的“影像化”热潮·····	(205)
导 论·····	(205)
第一节 论“影像”化叙事在海派小说中的本土化走向 ——以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为中心·····	(209)
第二节 从媒介交互性看当代小说叙事的“影像化”热潮·····	(219)
后 记·····	(230)

绪 论

“前沿”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名词，似乎代表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与方向，是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关注的课题。在今天高校选修课程里，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命名的完全没有吸引力，而如果是“中国现代文学前沿”之类的概念就充满了召唤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前沿”？前沿意味着什么呢？如何才能“前沿”？

必须看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前沿”常常指的是某种最新的思潮。学术的前沿就是能够及时应和这一思潮，体现其基本立场与思路，甚至换用其术语与概念。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启蒙主义与现代化思潮，包括其中一系列概念如“启蒙”“救亡”“现代化”等等；20 世纪 90 年代有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反现代性”也频频出现。

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术发展的事实，然而，进一步引人思考的却在于：当我们将学术的创新更多依托于最新流行术语的移植，而“前沿”就等同于“新潮”，而“新潮”又有意无意地等同于“西方学术界的流行”，那么，我们会不会将一个严肃而复杂的学术问题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我们是不是就此丧失了作为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主体意识？

在学术新潮的高速运动之后，人们重新提出了一个“返回历史现场”的设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被看作是“返回历史现场”的基本方式。前沿，就在那些丰富而被人们忽略了的历史材料当中，当我们返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也就是找到了学术的“前沿”。

前沿，就在历史材料之中，这无疑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判断。不过，所谓返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也就是找到了学术的“前沿”，这却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陈述。因为，所谓历史的“真正现场”其实也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存在，如果以为返回现场就意味着放弃人的主体的思考与选择，那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历史的材料，一旦成为我们讨论的对象，那么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交织着研究者主体心灵的因素，如果说历史之中存在着我们的“前沿”，那也是因为有了我们研究者独特的心智，是我们从中“发现”了“前沿”。

换句话说,“前沿”之所以能够从一大堆芜杂无序的“材料”中凸现出来,就是在我们的主体感知程序中,它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吸引研究者付出投入的热情,而前所未有的投入和努力便最终形成了学术的创新。前沿,的确就在历史材料之中,但更准确地表述却应该是:前沿,在研究者主体心灵对于历史“问题”的重新感受和清理当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前沿,就是我们在持续不断的人生体验与文化感受中对当下“问题”的领悟,“问题”的当下性就是学术之“前”、学术前进之边“沿”。在当下“问题”推动中发现“前沿”,这才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我们如何才能“前沿”起来呢?我以为基本的方向有二:一是让历史材料成为我们突破既有思路的启示,让新的事实呈现调动我们异样的感觉,与固有的研究相比较,这是我们自我思想在发展,是自我思想发展挺进到了以往之“前”;二是不断保持着对于自身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反思与检讨的姿态。作为研究者,我们不仅要不断地追问研究对象,也需要不断地追问我们自己:现有的方法与思路合理性在哪里?不合理性又在哪里?如何评价我们的学术立场?

对于前者即历史材料的重视和利用,这在近年来已经获得了学界的相当的倡导,连续不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会议都以此为题,甚至专业化的学术刊物都已经问世;但与此同时,我们对自身学术传统的反思与检讨还是十分不够的。这里我们不妨略加评说。在笔者看来,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如何才能获得自己独立的形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可以说,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推动着我们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的发现。

我们知道,从“走向世界”的20世纪80年代到“现代性质疑”的90年代,当代中国的文论家们都在不断致力于中国文学思想的建设。然而,回顾近20年来的这些主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其中相当多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辨析西方诗学的关系之上,一系列与西方诗学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成了梳理和阐述的主要内容。如果考虑到自现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理论产生的世界性背景,这样的追溯当然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关于文学的判断也同时与文学创作本身渐行渐远,我们注意的是当代思想在“超越”具体文学实践意义上与西方文化、西方诗学潮流的沟通和对话,但忽略了对中国文学实际的感受、体验与把握。

其实,离开了中国新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复杂事实,我们很难解释现代中国

何以会产生一种区别于古代文论与诗话的新的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在新文学创作的激发中出现的，并且首先就是由中国新文学的实践者来加以阐发的。例如最早的中国现代文论之一胡适的《谈新诗》，关注和解释的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因为“这两年来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候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①。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我们看到，是丰富的文学的事实激发起了理论家思考的兴趣、解释的冲动和新的理论建构的欲望。反过来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批评首先也应当成为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新话题的理性说明，而不是为了成为西方某种文学理论在中文世界的运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在当前要进一步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再仅仅沿着 20 余年来“国门开放”、不断追踪西方文论动态的选择是大有问题的，因为，一个民族关于它自身文学现象的归纳和述说在本质上是为了证明它自己的生命力量，归根到底来说并不在于厘清与外来文化、外来诗学的关系（尽管这也仍然可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可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重新回到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当中。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认真发掘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也是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我们却不可陷入另外的一个自我封闭的思路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民族传统并不是在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立场上才有价值，“民族化”和“传统性”的生成一旦被置于与“现代化”和“西方性”相对立的立场，那么这一命题所包含的空间也就十分的狭小了，在被切断了与当代生存的有机联系之后，它事实上只能是既往的一套已经成型的思路与概念的运用而已。前些年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失语症”的问题，意在揭示西方文学理论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思维的浸染。在我看来，袭用外来文学思想还仅仅是一个更深问题的表象，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自我文学感受的丧失，当自我感受一旦丧失，那么我们关心的就不再是我们文学实际遭遇了哪些“问题”，我们又该怎样运用自己的思考来分析这样的问题，袭用外来的文学思想不过是自我感受丧失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忙碌于横向的“翻译”而无暇他顾固然会导致可怕的“失语”；同样，如果一味忙碌于纵向的“继承”也依然会令人遗弃当下，这自然也属于可怕的“失语”。

^①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册），花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页。

回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学术思想的拓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已经存在过的中外文论遗产如何为我们研究者加以继承、学习的问题，对现代中国发生的文学现象如何加以准确体会和思考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我们“前沿”的学术应该这样建立：一个文学批评家准确地发掘自己的文学感受，使之上升成一种独立的思想形态与批评方式。每一个有志于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前沿”的学者首先应该思考的是现代中国的文学环境究竟给我们的作家提供了什么？中国当前的作家是怎样感受和描述这样的环境的？与外国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比较，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感受与文学表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些“问题”的解决便形成了我们新的理论设计，而这样的理论设计必然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我们的过去，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新的批评的趣味，属于新批评的命题。学术的发展“前沿”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呈现了出来。

第一章 现代长篇小说的史料发掘与史料整理

导 论

在所有的文学种类中，长篇小说无疑具有极为显赫的地位。别林斯基说：“我们时代的史诗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包括史诗底类别的和本质的一切征象。”^①他还认为：“长篇小说超过一切其他种类的文字，独赢得社会的垂青：社会把长篇小说看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从它认识到自己，从而完成自我认识的伟大过程。”^②的确，由于长篇小说较中篇小说或短篇小说而言，场面更为宏阔，结构更为开阖，人物更为众多，情节更为复杂，卷帙更为浩繁，自然被视为检验一个作家艺术水平与表现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正因为长篇小说具有非凡的广阔性、深刻性、复杂性与高度的艺术性，才被视为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文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成绩最为显著的门类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取得成功的标志性体裁之一。虽然因其特性于1922年才慢半拍起动，但一旦起动后便迅速走上了快车道，《苔莉》《倪焕之》《二月》《家》《子夜》《死水微澜》《一个女兵的自传》《骆驼祥子》《淘金记》《围城》《寒夜》等一大批作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丰美的收获。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至今没有弄清1922—1949年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现代长篇小说，也没有弄清最终有多少位作家在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字，至于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是如何发生的，在传播接受方面做了哪些努力，长篇小说各版本间是如何流变的以及装帧艺术是如何呈现的等内容，学界更是一笔糊涂账。而就长篇小说的创作艺术而言，除了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尚

① 别林斯基：《诗底分类和分型》，《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页。

② 别林斯基：《特列莎·杜诺耶》，《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页。

为学界所涉猎外，众多的二流或三流作家及其作品鲜有人问津，更不用说那些湮没无闻的作家与作品了。这无疑是现代文学界最尴尬也最亟待解决的课题。诚然，由于朝代的更迭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定延滞了这一基础工程的建设工作，社会日渐浮躁与精致的功利主义也延宕了这一问题的深入解决，但这些外部因素都不是我们今天逃避甚至畏难的主观理由，特别是当信息时代急速来临之际，面对一批珍贵的史料或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消失之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弄清现代长篇小说的全部家业，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转型研究留下一份殷实可鉴的家底。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深感现代长篇小说各类材料的匮乏，不仅许多接受史料无处寻觅，就连许多文本也无处阅见。正由于原版作品难觅，致使许多研究者望“现代长篇小说”而却步。虽然20世纪50年代后又有许多作家重新再版了自己的长篇作品，但由于做了修改，使这些再版的长篇小说刻上了特殊年代的政治印痕。以这些修改版甚至是改写版的作品阐释1922—1949年间作品的思想艺术，显然并不妥当。有感于此，当“还原”与“呈现”成为学界的主潮，当国家及高校的数据库建设日益丰富完善之际，编撰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以编年的方式呈现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面貌，最大限度地还原1922—1949年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为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做好史料上的准备，就成为笔者亟待达成的学术目标。

当然，由于史料工作是一项艰苦而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当今的评价体系下，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工作，致使许多人无心于此。因此，对于现代长篇小说研究中的史料错讹问题或不得而知，或视而不见，以致以讹传讹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视野的生成与深化。具体而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存在着如何辑与如何用的问题：在如何辑与辑录什么中，存在着辑录者“偏”“漏”“瞒”的现象；在如何用与用什么中，存在着创作者（也偶含辑录者）的“添”“改”“删”问题。据笔者对目前已出版的所有的研究资料集认真核查后发现，其辑录的有关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史料，都不同程度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原文不一的问题，若不进行认真核查肯定要掉进失误的陷阱，甚至一不小心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以讹传讹的蔓延。如此触目惊心的现状也促使我必须回归第一现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全面、真实、客观地为学界提供一部翔实而具有权威性的编年史著作，为来者也为历史搭建一个继续攀登的阶梯。

选辑的两篇文章即是笔者近年来在这一方面的初步思考。

第一节 如何辑与如何用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与接受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史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并严谨地运用第一手原始材料，回归现场，还原历史，做出符合历史本相且客观的评价，是每个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笔者近几年来在对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中，就是秉承着这一精神去操作、去实践的，虽然还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但毕竟是笔者努力与追求的目标。也就是在发掘与整理现代长篇小说史料的这几年来，笔者认为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辑录者的“偏”“漏”“瞒”，二是创作者（也偶含辑录者）的“添”“改”“删”。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视野的生成与深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现代文学史接受视野的生成与深化），有必要将这些问题指出来与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也希望能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研究有所助益。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侧重点在于这些史料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产生的影响，而不是这些史料背后的思想史或文化史意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辑录者的“偏”“漏”“瞒”

如何辑录史料和辑录什么对于成熟规范的古典文献学而言，自有其基本的辑录原则和严整的操作规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而言，虽然对此有所借鉴并达成相应的学术共识，但由于岁月动荡所造成的史料遗缺，或时代语境对接受者观念的束缚，或当事人及其亲属对可能关涉利害关系的顾虑，等等，如何辑录与辑录什么就成为辑录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表现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的辑录上，对这一问题的顾虑就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偏”“漏”“瞒”的问题，对现代长篇小说接受视野的生成与展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谓“偏”是指辑录者由于受接受观念等的影响而有意对接受史料表现出的倾向性，从而使呈现的接受视野基本为该文本的正面阈值的择其要录，而非全面的客观的视野呈现。这虽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该文本的接受史态，但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辑录立场，依然遮蔽了历史的原貌，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来的接受者。这种因显在的倾向性所导致的史料缺辑，笔者称之为“偏”。当

然,“偏”与“漏”不同,也不是“瞒”。“漏”是因为客观条件所限不知尚有相关文献造成遗缺;“瞒”则是有意隐瞒,多是将负面的史料刻意隐去。若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为例,“偏”多指仅列入资料索引但不节录其原文。“漏”和“瞒”则既不见正文,也不见索引,但“漏”为非主观因素所致,“瞒”则为主观因素所为,二者有着较为明确的界限。明晰了这一区分,我们就可以对“偏”“漏”“瞒”的现象作进一步探讨了。

先说偏。文学接受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因而西方有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对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来说也不例外,而且越是有影响的作品接受的分野就越为显在。例如,当年《子夜》刚一出版,陈思、禾金、门言等就对《子夜》提出了不同的认识,^①但在《茅盾研究资料》和《茅盾专集》中^②,这些不同的质疑声并没有全文或部分节录其内,若以这两本史料所辑录的文章为中心梳理《子夜》的接受史貌,则会认为《子夜》自出版始就获得了高度的肯定,实际上,《子夜》的接受是在多向的质疑声中拉开序幕的。^③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围城》中。方典(王元化)的《论香粉铺之类》和张羽的《从〈围城〉看钱钟书》两文在《钱钟书 杨绛研究资料集》中也未予以节录^④。当然,这两篇文章学理性不强,是否节录见仁见智,但如果将当时这两篇并不长的反对声音节录于书中(即便是其中的一篇),既反映出《围城》的接受史貌,也达到为接受者提供检阅便利的目的。这不仅是因为当年对《围城》的理解确实存在着争议,还因为后来的接受者在反驳《围城》的攻击时往往举其为例,若能节录其中,自然能使接受者事半功倍。另具典型性的是前美国新闻处总编辑华思的遭遇。《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华思很快写了《评〈骆驼祥子〉英译本》一文,高度认同这部表现“一个想到北平谋生的青年农民的快乐与数不清的烦恼的直朴的故事”,将它视作了解中国普通人民的人道主义及其不可毁灭性的一本“最适当的著作”,认为它能在美国传播,是“中美了解事业中的一件大事”。^⑤然而,这篇极具重构意义的接受视野却未能辑文于《老舍研究资料》,令人遗憾。如果说《子夜》

① 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8页。

②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唐金海、孔海珠编:《茅盾专集》(第二卷)(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见陈思广:《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六章《未完成的展示》。

④ 田蕙兰等编:《钱钟书 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⑤ [美]华思:《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扫荡报》1945年8月27日。

《围城》的辑录之偏或许有维护文本的“经典性”之意，那么《骆驼祥子》的辑录之偏是否是由于阐释者为美国人，而当时——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美观念尚存偏见而失之于文呢？

再说漏。史料是个无底洞，穷尽史料的意愿只能是美好的愿望。但随着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以及全国各大图书馆（含高校图书馆）相应数据库的建立，许多所需史料足不出户就可通过电脑予以检索，极大地方便了史料的辑录，一大批以往未被人们发现的史料也重新被发现。例如杨邨人的《茅盾的〈子夜〉》^①、尉迟憩亭的《赵子曰》^②、石岩的《读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③、凯蒂的《关于〈引力〉》^④、中山大学文学院关于《〈春寒〉讨论总结》^⑤等等，仅就笔者近几年搜集整理的现代长篇小说的新接受史料为例，未见于各研究资料索引的就达50余篇，若再肯花点时间或随着高校数据库检索系统的更加完备，拣“漏”过百并非不可能。当然，这个“漏”是正常的“漏”，但对于接受史貌的归纳与梳理以及接受视野的拓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于《骆驼祥子》的接受就有学者就认为：“对《骆驼祥子》的批评意见在当时竟比肯定还多！”^⑥还有的学者直言：“《骆驼祥子》生不逢时，民族危亡在即，很少有人关注这部作品问世，即使后来注意到它的存在也没有精力写成像样的研究文章。”^⑦这显然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而关于《春寒》的接受很可能被误认为无人问津等。但有些“漏”，如《萧乾研究资料》^⑧，没有辑录一篇关于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的接受文章，就令人感到失望，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研究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后说瞒。瞒是一种刻意的主观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以为，为贤者讳当是主要的原因。例如，在《叶圣陶研究资料》中^⑨，钱杏邨并不认同《倪焕之》的“扛鼎性”，他说：“茅盾说，《倪焕之》是十年来的扛鼎之作，但我们却不能说出《倪焕之》是如何的‘扛’法。”这一视野出自《一九二九年

① 《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3年6月18日。

② 《津汇月刊》1935年第4期。

③ 《中坚》1946年第1卷第1期。

④ 《风下·新妇女临时联合刊》1948年第3期。

⑤ 《青年知识》1948年第35期。

⑥ 史承均、宋永毅：《老舍研究的历史回顾（1928—197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4期。

⑦ 石兴泽：《老舍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⑧ 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⑨ 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文坛的回顾》，原载《现代小说》1929年第3卷第3期，署名刚果伦，后收入神州国光社1930年5月出版的《文艺批评集》第190~205页。但辑录者辑录的只是《文艺批评集》中的《关于〈倪焕之〉》一文，而对《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关于《倪焕之》的否定性接受文字“视而不见”，这就有“瞒”的嫌疑了。再举一典型的实例。李克异（1920—1979）是现代优秀作家，原名郝维廉，又名郝赫、郝庆松，笔名吴明世、袁犀、李克异等。由于他在日伪统治华北时文名显赫，如何编撰《李克异研究资料》就成为编撰者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本由李士非等人编集而成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李克异研究资料》，就成为只收集李克异正面史料的一本“半成品”，而关涉其负面的材料则全部未予以收录，这就不能用“漏”来解释，而只能是“为贤者讳”的“瞒”了。例如，1942年11月《华北作家月报》第2期曾刊登一消息：《斡旋会员郝庆松献金》：“会员郝庆松前由本协会派遣赴济南一带视察治运状况，一路收获颇多，今为感谢皇军赫赫战果，自动愿尽枪后国民之诚，将治运视察旅费金提出一百元，献金与北支派遣，当由本协会代为斡旋呈送北支军局矣。”同时还刊有一文：《由都市到乡村——治运视察报告会讲演词之三》，作者郝庆松，文中有如下字句：“在乡下我看见了英勇的日本军、治安军，他们在千难万苦之中，从事着职业工作，对于本次治运运动之一的‘幽灭共匪’，不待言说的持有着坚定的信念。而农民们出由各方面协力这工作，修护着道路，修建关楼，双手□（方框属于无法辨识的字——编者注）是的从事着这样困难艰苦的工作。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这一伟大丰实的理念，倘说是由农民之手，由农民之力完成的，也非恰当。”毫无疑问，这是郝庆松附逆时的发言，辑录于书对后人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存在。在长篇小说《贝壳》的接受上，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这部小说曾于1943年获“大东亚文学奖副奖”，而且因之引起了一番争议，^①但是，这一争议现象同样失收于《李克异研究资料》。至于批评的接受视野，哪怕是较为准确的评价，如麦耶（董乐山）认为：“很显然，作者的目的，是想借这一本小说，暴露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丑恶。”但由于作者对于知识与教养的价值的否定理解，使作者“没有把握到它们的本质，只表面地看到了一些它们被歪曲施行了的一些丑恶的现象，便贸然发出这种‘对人类的哭声，对于人类的绝望。’于是，便陷入了悲观主义的泥淖，在《贝壳》这本小说里的人物，便全是‘苍

① 相关文章见志智嘉：《以什么为基准而授赏了的呢》，《敦邻》1944年第1卷第4~5期；雪魂：《关于袁犀和贝壳（拉杂的文谈）》，《敦邻》1944年第1卷第4~5期。

白而贫血的’，而其思想，也是颓废的，怀疑的”^①。该书也采取了“回避”的方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这本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与权威性产生怀疑了。历史就是历史，刻意隐瞒绝非史料工作者所应有的态度。《敦邻》《杂志》《华北作家月报》等是日伪时期著名的文学刊物，甚至可以说是研究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基本杂志，许多省级以上图书馆或老牌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编撰者未能将这些基本的材料搜集于内（索引仅收《华北作家月报》第7期），史料难觅恐不是主要因素。我想，这不是个案，对于沦陷区作家，对于附逆文人（例如《张资平研究资料》至今未能出版），如何辑录和辑录什么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二、创作者的“添”“改”“删”

创作者毋庸置疑拥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但本文所指的并非是作家对小说文本的修改，而是指创作者（也偶含辑录者）对接受史料的“添”“改”“删”，即对小说《前言》与《后记》的“添”“改”“删”。由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曲折多变，跨越不同时代的作家们为了应和时代的语境在重版旧作时大多对《前言》或《后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对《前言》或《后记》的“添”“改”“删”就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当然，如果这种调整是一种正常的创作感言与思绪传达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或者说需要接受者对这一接受史料加以辨伪，否则极易堕入虚假推定、以假乱真的泥沼，甚至对文本产生误读，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了。

我们同样先从“添”说起。茅盾的《子夜》自1933年1月出版以来，一直沿用初版的《后记》，直到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再版《子夜》时，才新添了茅盾应邀写的《再来补充几句》作为新的《后记》。从此，这一版本成为新时期最为通行的版本，而茅盾在其中关于《子夜》的创作意图及主题的阐释亦广为流传，特别是策应“社会性质论战”与“反对托派说”的观点，影响深远，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理解《子夜》创作意图与主题的唯一视野。如钱理群等就认为：“吴荪甫的悲剧命运正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

^① 麦耶：《贝壳》，《杂志》1944年第12卷第5期。

路的。这是《子夜》的主旨所在。”^①但是，如果以此对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回答托派说”的创作意图与文本的客观呈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罅隙，即，关键人物的失败因由与结局走向并不契合作者对创作动因的理性揭示。例如，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并不是败在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手中，而是败在杜竹斋的倒戈上。正如小说所写的那样：“要是吴荪甫他们的友军杜竹斋这当儿加入火线，‘空头’们便是全胜了。”也就是说，当吴荪甫与赵伯韬在公债市场相互胶着甚至略占上风时，善于见风使舵与投机经营的杜竹斋见义忘利，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多头”，使得吴荪甫最终一败涂地。又如，茅盾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是两条：一是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是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但文本的实际结局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既没有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只有周仲伟被迫买办化，而吴荪甫只是对此有过动摇的念头），也没有与封建势力妥协，而是以一种悲壮的破产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商战之旅。因此，茅盾的“回答托派说”实际上成为预设《子夜》创作意图的一个温柔的陷阱。所以，夏志清将《子夜》视为一部“透彻地表露一九三零年的中国面貌”，“给中国社会来一个全盘的检讨”的小说。^②而这正与茅盾在初版《后记》中的自述——“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相契合。再比如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1957年出版《茅盾文集》第四卷时，茅盾在《第一阶段的故事》之末增添了《新版的后记》。与原《后记》不同的是，茅盾特意提到了小说的人物“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说：“这本小书的结尾已经写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到陕北去。这是象征着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或地主的家庭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间的觉悟分子已经认识到唯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这才中国民族能够解放，而个人也有出路。”这一进步的表态，无疑迎合了当时的期待视野。的确，小说的结尾也确实写到了仲文、桂卿等商量着准备去陕北的事，但如果我们稍加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何家庆并不赞成仲文他们去陕北，何小姐虽然也想去但认为这是一个消极的方案，而仲文自己又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又觉得现在一心想到西北去的人们中间，有不少是一时冲动，好奇心，更有不少是借了投身到革命的最前线的美名，实行逃避他在后方的艰苦而需要耐心的工作；这种浮薄偷懒的心理必须赶快纠正才

① 钱理群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②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31、136页。